

2017年列文森奖得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雷勤风： 用幽默理解中国

姚佳琪

作为文化史学家，我不觉得这些关于笑的文化现象是小道

文汇报：在一般文学史和历史的视野里，中国的近代史主要和苦难、斗争这些词语相关联。如同林培瑞(Perry Link)在您这本书封底所言，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大家更倾向于关注沉重的问题，那么笑史的主题是如何进入您的视野的？

雷勤风：在研究生和博士生阶段，我接触到很多关于近代中国遭受战争痛苦的议题。很多话题很好，但让我感觉有些重复。虽然我们仍旧期待着更好的论述的出现，但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发展得很完善了。

另一方面，这也和我个人的兴趣和性格有关，我本身就喜欢喜剧性的东西，从小就喜欢巨蟒剧团(Monty Python)和马克思兄弟(Marx Brothers)，我喜欢他们笨拙荒诞又滑稽的表演，后来我开始学会欣赏他们深奥的笑话和双关语。这一切使得我逐渐对中国文学产生了疑问：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否有类似巨蟒剧团的喜剧作品。就此我发现关于中国喜剧的研究比较少。虽然大家多少谈论过老舍、钱锺书，或者鲁迅的幽默，但我关心的是关于此的整个谱系，不仅是严肃文学的，还包括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从识字之人到精英、教授，还有剧作家等等。收集了一些材料后，我发现当时的幽默形式和类型非常多样化，我的研究也变成了一场发现之旅。

文汇报：您研究时有碰到什么困难吗？

雷勤风：我想最大的困难在于我的研究需要大量的报刊和书籍的出版品。第一，我使用的材料相当多，所以跑了很多国家和地方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去了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等等，也托了很多人帮忙，因为有些书和笑话集的印刷量不是特别多，它们只是一时流行，没有留下多少实物。第二，我们知道当时有不少口头文学、相声、滑稽戏或者其他的戏剧艺术，但是很多人都不识字，或者没有把段



前不久，北美亚洲研究会将会2017年度现当代中国(1900年以后)研究相关的列文森图书奖授予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雷勤风(Christopher Rea)的著作《不敬的时代：中国新笑史》(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列文森奖为纪念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约瑟夫·列文森所设立，每年度颁发一次，旨在奖励为理解中国作出杰出贡献的英语学术著作。《新笑史》一书为解读近代中国文化史与文学史提供了全新

的角度。晚清以降，近代中国历史中充斥着苦难、悲痛和无尽的动荡，然而《新笑史》却告诉我们，晚清民国也可众声喧哗，以笑来书写。笑话、游戏、诟骂、滑稽、幽默，各色笑声各安其位，在中国面临现代性的焦虑之时，“笑”提供了一种了解中国的不同路径和叙述方式。

在《新笑史》之外，雷勤风曾编辑出版《文化的生意：中国及东南亚的文化企业家，1900-60》(The Business of Culture: Cultural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900-60)(和傅郎[Nicolai Volland]合编)，《中国的文学世界主义者：钱锺书、杨绛和文学世界》(China's Literary Cosmopolitans: Qian Zhongshu, Yang Jiang, and the World of Letters)等著作。

近日，本报特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姚佳琪就这本获奖著作和笑文化在中国等问题对雷勤风进行了访谈。

图/Julie M. Wang 摄

子写下来，也许他们在广播和留声机的唱片里留过记录，可惜抗战时期日本人轰炸了上海闸北，很多电影、唱片都被战争销毁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文本大部分是1950年代由编辑和老大师合作之后重新编辑出版的。问题在于编辑会进行删改。所以这些出版物都只能算1950年代的文化品。

文汇报：您在研究这些笑话和这个主题时，有没有碰到什么质疑？笑话和游戏似乎被很多人看作一种“小道”。

雷勤风：《金瓶梅》和《红楼梦》都有一些讲笑话的聚会，《镜花缘》也有好几章大家都在说笑话，所以大家说笑话不登大雅之堂，其实并非如此。有一章我专门讨论“好笑的骂人法”，为什么在晚清民国掀起骂人热。这和报刊文化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以前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文人会私下骂他，到了民国的时候，那些文人会在报刊上写公开信，说某某学者的书写得太差，或者互相公开讽刺，结果越吵越热闹。这种笔战编辑们都很喜欢，会很卖座，很多人会因为这些骂战去买杂志。可见有时笑话与幽默确实参与到知识分子以及普通读者

的生活中去，并非“小道”而已。

不过有几次我在公共演讲中分享我的研究，现场有观众质疑我是不是把中国的家丑外扬。然而作为文化史学家，我关注的是当时存在什么文化现象，它是否重要，如果重要的话又为何重要。至于别的都是无关的考虑。我不觉得这些关于笑的文化现象是小道，虽然不受很多人的肯定和承认，它们其实是当时的文化主流之一。它有时显得浅薄，所以虽然人人都会看到，但并非每个人都会仔细思考现象背后的问题。

文汇报：书的副标题是“新笑史”，您怎么看待它和主流文学史的关系，是一种颠覆、一种补充，还是平行的关系？

雷勤风：现代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领域里对喜剧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我觉得这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主流领域的论述互补。我在第一章里举出的最鲜明的例子是吴趼人，他在写《痛史》的同时也在写《新笑史》，所以这位多产的著名作家也意识到读者群体存在多种情感的诉求。其他的学者指出，在他的《痛史》那部长篇小说里也有笑话，所以笑与痛并无矛盾，《痛史》也并非从头到尾。

中国文学现代性不是百分之百基于泪和痛苦

文汇报：在您的论述中，“痛”和“笑”似乎有一种紧密的关联，我们该如何看待“笑的文学”在历史中的作用？

雷勤风：一个非常基本的出发点在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根性在哪里。我书中有一个比较浅层的观点是，中国文学现代性不是百分之百基于泪和痛苦。因为在一些其他的传统中，很多人会把现代化的过程看作一种喜剧性的过程，人生和社会在一直进步，会越来越好。我在书中第三章提出了“娱乐可能性”(entertaining possibilities)的说法，中国的未来怎样我们并不知道，也许有痛苦的一面，但也会有喜剧性的一面。痛苦的部分说不定也会引发一种荒谬感，其中含有很多反讽的乐趣。所以，不管是梁启超、吴趼人，还是其他的晚清作家，他们提出的历史观，不止是说过去受了多少苦难而流泪，或者过往太过荒谬而发笑，他们也是向前看的，所以我的新笑史的历史观，不止是往过去看，也看向未来。一般人会把笑当作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反应。但“笑”也是一种想象未来可能性的方法。

文汇报：从博士论文到成书，其中章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您为何最后以五种“喜剧潮流”(comic trends)作为章节主题？

雷勤风：博士论文和出版图书不同的地方在于，博士论文更像一种对材料的编写，我想我的论文也不例外。当然我的博士论文的论述视野更广，比如有一章论述战时内地、上海等地域，还有一章关于漫画、漫画杂志，一章关于电影，特别是早期有声喜剧电影，其中有很多闹剧的成分。在写书的过程中，我将论述视野缩小了一些，并以关键词作为索引，更加系统化。举个例子，在论文中我详细追溯论述了小说《何典》的接受史，小说在1920年代被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所发现。在博士论文中，这只是一个案例研究，在书中我重写了这一章，主要关注“诟骂”或者说“笑骂”的主题。这帮助我重新思考这个主题在那个历史时间

点的特殊意义，也让我深入探索了一些问题，比如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人们如何互相咒骂，那些国外回来执教清华北大的知识分子为何在报刊上骂人，这究竟有何重要？

我觉得一本书有几种不同的读法。你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娱乐、一本教材，甚至于一个智库，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另外，我想这本书也可以鼓励别人对那个时代的喜剧文化作进一步的研究。我的篇幅有限，一个人的能力也有限，但是我记录了几年来找到的一百多种幽默笑话集。我希望未来还会有人做更为充分的研究。又或者像刚才提到的《何典》，这本书的流传史是非常有趣的，不论是在1920年代的北平，或者是1930—1940年代的延安，都有读者，我也把它的版本情况放入了附录。

文汇报：为什么是“笑话、游戏、诟骂、滑稽、幽默”这五个关键词？

雷勤风：我想要从内部书写中国的喜剧史，所以我关注一些在当时特别有影响力的关键词，所有的章节题目都是双语的，除了“诟骂”，其余的标题，“笑话”、“游戏”、“滑稽”和“幽默”，都是某一阶段可以替代英语中“humor”(幽默)或者“comedy”(喜剧)的中文词语，我点出它们之间的各种异同。这些是大方向的引导。当然这本书是用英文写作的，我试着想要告诉读者，关于笑的这些文类在中国是怎么被定义、被模糊以及被政治化的。

在收集和整理材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各种文章段落散落四处，如何组织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关键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它将很多相似的文章写作串连在一起，所以我决定每章处理中文语境中的一个关键词。比方说“游戏”，它在晚清民国非常有明确的指向：游戏文章、游戏文字、游戏场等等。游戏场是一个新兴的娱乐地点，比如上海就有大世界、小世界、新世界，有十几种不同的世界。新加坡也有，天津也有。所以要讨论“游戏”的历史性时，它在民国的独特表现不容忽视。它的含义一直在发生变化，现在在谷歌百度里搜索“游戏”，都是电子游戏了。那个时期还有很多“游戏照”(trick

(下转6版) ➔